

津开放为通商口岸。各国在天津建立租界，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天津，英国伦敦会就是其中一支重要的传教力量。为了培养传教人员，1864年，英国伦敦会在天津法租界海大道（今大沽路）建立一所圣经学校，名为养正书院。该书院是伦敦会培养华北各地传教士的主要机构，曾培养数以百计的中国传教士。^[3]养正书院第二任院长为赫立德(S.L.Hart)，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理科，他与兄弟赫辅德(Walford Hart)来到中国后曾在武汉传教。赫辅德于1894年因病去世，赫立德后被调到天津。赫立德根据他在天津的传教体会，认为应培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更符合英国利益的人才，而不仅仅限于传教，因此他建议把养正书院扩建为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同时以此来纪念自己去世的兄弟赫辅德。^[4]此事得到了英国伦敦会总部的同意和英国政府的赞助，英国工商业也给予了大力支持。1902年，新学书院（又称天津英华学院）正式建成，赫立德出任第一任院长。

在新学书院成立伊始，赫立德曾多次组织英国教员以游历为名，深入我国的晋、陕、冀、鲁、豫、内蒙古等地，猎获飞禽野兽，采集植物标本，并收集我国部分地区的人文地理风貌等资料，如在陕北发现许多蒙古人攻延安时被破坏尚未修复的庙宇、在彰德府发现的许多甲骨中找到一块珍品等。赫立德的考察队还沿着京奉铁路到达沈阳、铁岭、新民、宽城子等处开展考察，并深入吉林，对东北各地农业生产以及风俗习惯进行调查，此外，还在胥各庄调查车站附近种植染料靛蓝的生产情况。他们的猎获物也都由英国教员苏尔比(A.C.Sowerby)剥制成标本。^[5]赫立德的兄弟赫辅德来中国前曾在南太平洋一带从事基督教传教活动，同时他也是一位收藏家，对于东南亚的人种学、民俗学文物以及动植物标本均有所收藏。^[6]这些丰富的资料和藏品为成立博物院奠定了坚实的馆藏基础。

作为一名教育传教士，赫立德认为：“泰西诸国凡通都大邑都设有博物院，而英国伦敦尤多。凡天下各种物类，有益于人之学识者，无不广搜博取，汇集院中，使人随意观玩，以广其识。”^[7]“博物院之设，所以格物理、开民智，实大有益于国之振兴也。”^[8]他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指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人心之灵穷万物之理，是谓格物。学者，苟能即物穷理明。人之灵明日

启，识见日增，化鄙陋为文明，起衰颓为强盛，此博物院所以由设也。”^[9]赫立德对博物馆在普及科学知识，开启民智，振兴国家，促进文明发展方面的作用有深刻的体会和认同。同时，由于此时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立博物馆具有明显的宗教目的，是新教科学传教的重要工具，^[10]赫立德也指出：“通过研究这些大自然的瑰宝，我们对主就能多些了解，谁能创造出比主的这些作品更精彩的作品呢！”^[11]因此，1904年，赫立德依附刚建成不久的新学书院，利用赫辅德的私藏和考察所获得的藏品标本，建立华北博物院（又称天津英华博物馆，The Tientsin Anglo-Chinese Museum），以辅助教学和基督教传教工作，将积极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与科学传教结合起来。

二、华北博物院的藏品和陈列情况

华北博物院与新学书院北楼同时修建，同在海大道，和书院大礼堂相连，楼上楼下各有房屋两间。赫立德在设计北楼建筑时，就把大礼堂的楼下划在博物院内，作为动物标本陈列室。由于西方国家图书馆与博物馆常在一起，因此华北博物院也和图书馆相连，使得来博物院参观的观众有未达其理者可于图书馆进一步查阅相关图书资料，答疑解惑，获取相关知识。

在藏品类别方面，据1936年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一览》记载，该院所藏物品分为：天然博物、地质矿产、南海岛民材料、模型、各国文字之圣经版本、王懿荣旧藏甲骨一部分，^[12]为典型的自然历史和人类学博物馆。

在展厅陈列方面，长期在天津任记者的英国人雷姆森曾在其1925年出版的《天津租界史（插图本）》一书中写道：“这个学校里有一处有趣的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收藏的中国珍宝古物以及华北的一些鸟类和野兽标本。”^[13]天津博物院元老陆文郁也曾回忆道：“彼时常去参观，但几次都是我以外无第二人。院外正面悬挂着横匾，刻有‘华北博物院’五个大字，门旁有一小窗，系卖票处，票价二角，不给票，给一本说明书，参观者可对着书入内参观。由卖给我书的人出来开门，等我进去，又把门关上。陈列物品情形：入门一间，周围皆系玻璃橱，上盖白布帘，参观时布帘揭开，橱里全是昆虫标本。最具特色的有南